

一个人，一座城

——马晓燕散文集《一生只爱一座城》

□ 雍措

我是断然没有资格给晓燕散文集写序的，但是她拿出特别黏人、柔软的一面对我，让我无法拒绝她。我和晓燕相识是很多年前的事了，因为是很多年前，所以现在已经完全记不清当时我们是怎么相识、因何缘由而相识。不过我相信，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今生的遇见，无论好坏，无论善恶，都是上辈子修来的。

遇见晓燕是我的福气。晓燕是一位安静、优雅的姑娘，属于在喧哗中可以为自己内心寻找一隅安静的人，就像风可以刮乱一树青绿，可只要你认真观察，总有那么一两片绿叶在乱中，自己待在一个角落，安静地生长。晓燕就是一位不为世间喧哗，自己置身在角落，静心生活的好姑娘。

记得有那么一次或者两次，我看见过晓燕独处一隅的样子，那么孤独，又那么美，让我忍不住去打扰她。如果你不了解外表清雅的她，你的内心会产生一种无法述说的距离感，但一旦了解之后，你会发现她是一位内心世界非常丰富且处世贴切的姑娘，只要你愿意和她说话，她会安静地、不打断你的听着，仿佛你给她说的每句话都落进了她的心里。而晓燕自己说话，轻轻柔柔的，有条不紊的，停顿的那一会儿，可以听见风声从她话语间穿过。晓燕的话让我觉得在清水里洗过，干干净净的，我怀疑从她嘴里永远说不出一句重话来。

文如其人。很久之前，我读过她的文字，那

本名叫《如果，我在唐家河遇见你》的散文集，至今仍放在我的书架上，唯美的文字，漂亮的插图，让我时时都想拿起来重温一下。这是晓燕送给唐家河和她的读者最为宝贵的礼物，是她让我知道了唐家河。

有时我在想，当我们用文字接近一座城的时候，是不是一座城和我们的内心就已通灵了。那些从键盘上清脆滴落下的每一个字，都是一座城向我们倾诉衷肠的声响，时而欢愉，时而忧伤，时而淘气，时而乖巧……她坐在我们身旁，和我们同呼吸，共命运。我们在凝望她的时候，她也在凝望着我们；我们在抚摸她的时候，她也在暗地里用另一种方式安抚着我们。当然，前提是我们和一座城之间，已经建立了深厚、真挚，愿意为彼此付出所有的情感。这种心甘情愿下流淌出来的文字，定然是一种有气息、有温度的好文字，哪怕偶尔有瑕疵，人们都能宽容地接受。

瑕疵在某种状态下，也是一种天然的美。

晓燕的文字，就是和一座城真诚相处下来的文字。她和一座城之间的推心置腹，让我想到朋友之间的亲密、亲人之间的浓情、爱人之间的甜蜜。她们在对方面前，平等、朴素、不做作，极致处，她们或许互相消融对方。

银杏、牵牛花、海棠花、玉兰、米枣树、蔷薇、桂花、槐花、梧桐、野樱花、蜡梅、栀子花，书店、菜市场、东桥、廊桥、天街、图书馆、租来的房子、咖啡馆……这些都是晓燕笔下的物景。从这些

物景中不难看出，晓燕向外界展示了一座自然生态的城市，扩展了我们对自然生态文学狭义的认识。自然生态文学不仅限于大自然，对一座城也适用。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晓燕文字里的内置空间开阔，她在写一棵树、一朵花、一条街的时候，并不仅仅局限于外在的、浅表的、没有内核的描写，她在给我们挖掘历史、现实的同时，也在和我们探讨哲学，这就增加了她文字的厚重感、可读性、丰富性，从她多维立体的抒写中，一座有质感、有文化底蕴又勃勃生机的城市在我们眼前逐渐丰盈起来。

晓燕用她柔软、温润的文字，写尽了一座城，我不禁想用一汪碧绿的湖水意象来夸赞她。在这些文字中，我还品出了独属于晓燕个人的气质魅力，她和这座城内在于的脾性是相通的，她或许就是自己的一座城。

晓燕似乎很喜欢花，其实我想说，晓燕就是花一样的姑娘。如果世间真有一种名叫晓燕的花，那她一定是不艳丽夺目的、不鹤立鸡群的、不喧哗浮躁的，而是清香持久的、素雅平静的、独处一隅的、高贵淡雅的。

我没去过四川，因为晓燕的文字，又让我爱上了一座城。

《一生只爱一座城》，这是晓燕新出版的散文集的书名，从这个名字足以看出她对这座城饱满、热烈的情感，愿美好的人，美好的城，一直美好下去。

林间的回响

——读薛喜君的《沾别拉》随感

□ 杨勇

我几乎是一口气读完了《沾别拉》。“沾别拉”是满语，“沾”意为“急流”，“别拉”意为“河”，合译为“急流的河”。小说的叙述方式也如这条“急流的河”，时而跌宕、时而平稳、时而低沉、时而高昂，步步为营的讲述方式让人不忍释卷。小说以黑龙江省森工集团沾别拉流域三代林业人的历史境遇、命运沉浮与生活变迁，呈现了新中国东北林区的发展进程与顺应时代的转型巨变。

阅读这部小说，我能感觉到作者那双审视历史的眼睛。小说鲜活的叙述语言、林区生活场景的扎实再现、丰满的细节以及生动的人物塑造，让林业工人的生活场景与历史演进可感可触。祖辈杨继业生活在日本侵略之下的林区，最后为保护森林英勇抗争，双腿残疾。父辈一代杨石山、姜占林、曲二手等成为共和国的第一代林业工人，在国家百废待兴时期，他们克服种种困难，奋战在采伐第一线，有力地支援了国家建设。在转型时代的洪流中，父辈一代陷入困惑与迷惘，生活困境也随之而来，他们开始迎接生存的挑战。而孙辈一代——杨春洛、高守利、葛丹、潘望、杨夏瓔等人，遇到的是林业转型期的挑战。他们中有的继续坚守传统林业工作，如高守利和杨春洛这一对夫妻，有的顺应“天保工程”转型，找到了生态林业多元经营的新出路，在艰难的转型阵痛中迎来了新曙光，如潘望和杨夏瓔等人。

作家并没有平面化地图解林业变迁史，对林区冬日的采伐生活、塔台瞭望、防火灭火工作以及日常生活、风俗节气，都有扎实的书写。同时在主线叙述之外，穿插了鄂伦春人葛丹对杨春洛深沉暗恋与无私守护的情感线索，以及曲二手谜一般的身世经历，二姐的传奇遭遇等往事。这些故事情节使得整部小说成为一幅立体饱满、厚重有力、摇曳多姿的画卷。

整体上看，这是一部严格按照历史进程与时间节点书写林区工人生活及林区变迁的作品，是献给无私奉献的三代林区人的赞歌。作家在书写中并没有只停留在这一个维度上，而是带着思考与前瞻性，对林区变迁进行了生态视角的关照与书写。这种“超前”或“朴素”的认知，赋予了小说深刻的意味。

杨石山作为一个典型人物，对于这位林区采伐能手地描写，小说中写道：“二十年来，他不光伐木，还带出了百八十名徒弟。如今他的徒弟们都在各个林场的第一线，个个都是伐木的顶尖好手。”然而，正是这样一个工人，却突然从挥舞斧头的自豪中发生转变。小说中写道：“他惊呆了，油锯掉落到地上。杨石山犹疑着低下头，仔细地打量那滩鲜红如血的东西——不是他眼睛出了问题，而是红松鲜嫩的茬口处，确实确实流出一摊血一般鲜红的液体。”这一情节略带魔幻，却真实反映了这位采伐二十多年的老工人内心深处的转变。这种转变看似朴素，实则也是时代转型的必然预兆。此后的杨石山常常自言自语：“我欠你的，我欠你的”，并开始躲避采伐工作，用工资购买红松树苗上山种树。他成了林区的“怪人”。周围人因生存发展的需要，并不理解他的行为。但杨石山日复一日地坚持着自己花钱买树苗，偷偷上山栽种红松。文中写道：“看着亲手栽下的树木像长大的孩子，放归大自然，任其在风霜雨雪中生长，他总是哑着嘴笑。”最终，杨石山倒在了栽树苗这一劳作的山林中。

杨石山上山植树这一情节，展示了林区人保护自然生态的觉悟，是这部小说尤为突出的部分。除了讴歌林业工人采伐资源、为国家建设做出的贡献，作家薛喜君更关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人类与生态系统和谐共存的主题。这一点也当与生态文学的书写相呼应。生态文学强调人类不是地球上的唯一和至上，强调用文学的书写来关注地球上的生态系统和共生。

实际上，西方的自然文学也是生态文学的一部分，或者说自然文学与生态文学是共生的。自然文学和生态文学在西方起步较早。世界性的大工业革命以后，资本主义处于上升时期，人类开始了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人类在快速获得经济效益的同时，

也付出了环境恶化的代价。在狄更斯的笔下，工业革命时代的伦敦就是一座煤烟蔽日的城市。西方一些具有觉悟的知识分子和文人开始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也由此开启了自然文学与生态文学的创作路径。其文风一度呈现浪漫主义的风格，后期则逐渐呈现出非虚构的散文文化倾向。

美国作家梭罗的《瓦尔登湖》，书写了他在瓦尔登湖畔建屋、耕种、观察自然的俭朴生活，呈现了自然对人的教育与启示，以及渴望回归自然的情怀；也强调了在工业文明时代物质欲望膨胀的人类社会中，避免异化、追求内心自由的精神境界。“只有在荒野中才能保护这个世界”，梭罗如是说。这部充满诗意与哲理的非虚构散文，是最愿意阅读的生态文学经典之一。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热爱生命》为大家所熟知，讲述了一个孤独的淘金者在荒原陷入困境，最终克服困境、得以生存的故事。小说展现了人在残酷自然环境中顽强的生命力。从另一个角度看，小说也隐含了人类开采金矿、对自然资源无节制掠夺的主题。杰克·伦敦笔下对荒原自然景观及生灵生存意志的描写，建立在敬畏自然的基础上。从中我们也应反思：人在自然中，是否真的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与力量？法国探险家西尔万·泰松的非虚构作品《在西伯利亚森林中》也是生态文学的经典之作。他离开巴黎，带着少量书籍和食物，居住在西伯利亚森林中的贝加尔湖边。他感受着湖在冬季的种种变化，体验着森林中的独居生活。他顽强地克服了冬日严寒，读书、钓鱼、劈柴、写作、打猎，回归到人类最初与自然浑然一体的本真生活。这种回归自然的情怀，是对城市无节制扩张和人类欲望膨胀的一种无声抵抗。

中国农耕社会时期漫长，自然文学在当时十分普遍。浓厚的生态意识并非一种自觉的书写，而是那个时代的本真面貌。作家笔下的“大江小岳、小桥流水、田园风光等”，皆发乎本心，与中国道家所倡导的“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思想一脉相承。近现代以来，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开始出现裂痕，修建铁路、开采矿藏、砍伐林木等行为逐渐增多，开始恶化的自然环境也给我们带来了生存的危机。如今，极端天气日益增多，水资源危机、土地污染、城市空气污染等问题，都是人类过度开发与掠夺自然所带来的反噬。作家们也显然意识到了以文学介入生态书写的必然性与必要性，如张承志、姜戎、迟子建等，均在此方面有所实践。生态文学，方兴未艾。

薛喜君的长篇小说《沾别拉》正有这样的使命感。小说中最动人的部分，是杨石山上山植树直至死在山林中的故事。这位老伐木工的后半生一共栽了三万五千一百零八棵红松，并用小本子记录了抚育树木的心得、树木成长的过程以及防治病虫害的方法。实际上，这部小说以大背景下的“天保工程”为依托，使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后代中得以延续。杨春洛、高守利与野狐狸“大美”的缘分，也是生态文学中的亮点部分，人与动物之间的互动呈现出自然的美好与和谐。杨夏瓔、潘望等人从事林下经济，种植与药用开发刺五加；葛丹等人种植寒葱，发展林下经济，这些都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型生存方式。

本版责编：张语婷

在地性诗学的重构

——浅析黄世海诗集《蜀葵》的书写范式

□ 李永才

诗集《蜀葵》以植物命名，却远不止于对植物的咏叹。它是一部以蜀地为经纬，以生命为内核的现代诗歌交响。诗人通过“根深蒂固”“枝繁叶茂”“花开花落”“香飘四溢”四个乐章的精心结构，完成了从地理空间到精神家园，从自然物象到生命哲思的深层建构，为我们提供了一部重构在地性书写的现代性文本。笔者现将《蜀葵》诗集的审美维度与写作范式略作分析：

一、在地书写与精神超越

诗集以“蜀葵”这一地域性植物命名，却超越了单纯的地域风情展示。诗人通过“根枝花香”的有机结构，构建了一个从乡土物象到精神家园的完整体系。主题呈现多层次的审美维度，首先是地理时间与历史时间的交织。在《龙门山褶皱》中，“三十七亿年的皮肤”与“青铜器的缝隙中反复诞生”的岩层，将自然史与文明史并置，形成深邃的时间透视。其次是具象景观与抽象哲思的融合。在《西岭雪》中，雪既是实在的自然现象，又是“像生存一样的哲学/像死亡一样的非理性”的存在之思。再者是个体经验与集体记忆的共鸣。他写金沙遗址，“我抓一把遗址的泥沙在手心/几个世纪都没有漏完”；写宝墩古城遗址，“瞬间支离破碎，剩下一柄石斧/从我梦中呼啸而过/又以稻粟抽穗的声音/响彻大地”；写三星堆遗址，“每一道纹路都是未解的语言/金杖仍在沉睡/等待一只穿越时空的手”将个人经验升华为对民族记忆的回响。

从诗集的内容来看，有以下几个特征。首先是自然意象与人文情感的融合。诗集第一辑“根深蒂固”宛如一株植物的庞大根系，诗人以笔为引，探向蜀地山水所内化的精神脉络。《金沙江大峡谷》中，“西溪河水浑浊，金沙江水清澈/它们瞬间交汇/就念出了千古的颂词/江水与溪水/如此亲切/这是水的宽容”，诗中“浑浊”与“清澈”的溪水交汇，暗喻不同生命状态的融合。诗人并未强调对立，而是以“千古的颂词”“水的宽容”升华出包容的智慧，与道家“上善若水”的东方哲学形成呼应，使自然现象获得精神厚度。这些诗篇并非简单的风景描摹，而是将山川、河流内化为精神的血脉，构建了一个根深蒂固的、无法剥离的文化与生命共同体。

其次是生命的张力与存在的哲思。第二辑“枝繁叶茂”将视角从宏大的地理转向蓬勃的生命本体。无论是《贡嘎山冷杉》在极端环境中“细紧脊椎”的坚守，还是《桥墩上的藤蔓》在水泥缝隙里“一直向上”的倔强，抑或是《山间竹笋》那“多么干脆，又多么粗粝”的拔节力量，诗人都在捕捉生命最原始的冲动与韧性。他不仅赞美生长，也审视生存的境况，《水边老农》道出了“原以为长在水边/可以长生不老，却一样零落成泥”的普遍命运，揭示了生命在繁华与凋零、希望与局限之间的辩证存在。

第三是时间的隐喻与诗意的轮回。第三

辑“花开花落”深入时间的核心，以花卉的荣枯喻示生命的轮回与美的瞬息。同题诗《蜀葵》点明主旨，它“最早现身蜀地”，平凡而坚韧，既入药入菜，具实用价值，又入画入诗，成审美图腾，是蜀地气质最贴切的象征。《花开花落》一诗中，“所有凋落的花瓣/都是萤火虫，风也吹不走/它们的姓氏”，死亡被赋予了不朽的诗意。诗人透过《凝视一片落叶》、《桃花落》等诗歌，不断叩问生命的归宿。在伤逝中蕴含对“来年的枝头”的期待，完成了从伤感到澄明的诗意转化。

第四是人文的烟火与灵魂的馨香。第四辑“香飘四溢”将自然之香升华为文明之香、灵魂之香。这里有《竹笋宴香》的世俗烟火，有《王建墓乐声》的历史回响，有《杨湾纸香》的文化传承，更有《布拖火把节之夜》的民族激情与《阿都高腔》的生命呐喊。诗人漫步于《龙潭寺香火》与《武庙》之间，在古今交汇处寻找精神的栖居。最终，在《奔腾的大渡河》这首长诗里，诗人将自然景观、历史传奇与现代风貌熔于一炉，以“一路疾驰向东/不问路有多长”的磅礴气势，将整部诗集推向一个开放、动态的结尾，喻示着巴蜀文明与生命力量的奔流不息。

二、空间叙事与内在律动

诗集的结构艺术呈现出空间叙事与音乐性的双重构建。诗人将地理空间进行诗学转换，从金顶、瓦屋山、金沙遗址到宽窄巷子，这些真实坐标被编织成既具体又超越的诗歌地图。如《宽窄巷子》中“宽窄两条街挤在一起/进去或出来/一生一世都走不到尽头”创造出独特的空间感知；《五丁桥》里“桥下的碎金，被商贾拾起来/倒入盖碗茶里”将历史记忆融入当下体验；《岷江浪花》以“支撑起每一寸山川与土地”的咏叹形成绵延的水系意象群。这些作品通过意象的相互呼应，构成了网状的诗意结构。在音乐性层面，四辑标题“根深蒂固、枝繁叶茂、花开花落、香飘四溢”本身构成完整的生长韵律。诗集中不同作品通过节奏变化形成内在交响。《奔腾的大渡河》的豪迈急板与《在柳荫里漫步》的舒缓行板交替呈现，营造出丰富的听觉体验。这种空间与音乐的有机结合，使整部诗集既承载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又保持着清澈的诗意流动。

三、古典意蕴与现代视野

诗人的语言艺术展现出古典韵味与现代意识的深度融汇。诗人将地质学术语如“褶皱”“断裂带”与植物学名词如“笋壳”“树脂”巧妙结合，再融入“羌笛”“经幡”等古典词汇，共同构筑出独特的语感密度。句法层面则体现出弹性构造，通过长短句的交错运用形成内在张力。如在《达古冰川的风与云》中“风把断层线/绣进天空”的凝练短句，与“等待三百万年的雪水/填满所有伤口”的绵长句式相映成趣。这种弹性在《花丛中》一诗里更显精妙，“风起时/我和花朵一起摇晃/在一阵阵花香里/慢慢融化”以流动的节奏创造出物我交融的审美体验。语气层面更展现出精微的控制艺术，诗人在陈述、折使、疑问等不同语气间自如转换，使《在桃子坪撞桃花运》的戏谑与《枯树新枝》的庄严共同构成了丰富的情感层次。

四、物象感知与意境升华

诗人的意象系统呈现出层次分明的感知结构。通过基础意象与升华意象的有机结合，构建起独特的诗意空间。在《新场古镇》中，“此地名叫新场，却流淌着旧韵/每处景致，一旧再旧/古柏、银杏、柳树、榕树/像清明上河图延伸出来的枝丫/古老、清新，有了现代的表情”，具体物象被赋予形而上的意蕴，完成从具象到抽象的跃升。诗人善于意象的陌生化处理，如在《金沙江大峡谷》中，“不用说，水肯定是善感的哺乳动物/我的眼睛牧着江水与溪流/不需要任何缰绳或鞭子/我为一条江与一条溪保守交汇的秘密”。这里通过通感手法打破常规认知，将水的特质赋予生命体温，进而将视觉体验转化为动态的放牧场景，使自然景观与人类感知产生诗意互动。这种意象处理既创造出新鲜的审美体验，又保持着内在的情感逻辑，拓展了诗歌的感知维度。

五、审美探索与技法融合

诗人在诗歌技术上展现出高度自觉。其修辞系统由转喻与隐喻交互构成，在转喻的运用上，凭借地理相邻性建立诗意关联，如《汉阳古码头》中“系缆石荒芜”转喻整个码头的兴衰史；隐喻则致力于深度开掘，如《复活的根雕》将雕刻过程隐喻为艺术创造对自然生命的重新唤醒，形成多义解读空间；拟人手法更获得哲学提升，超越简单赋予生命而带有存在论色彩，如《花开花落》，“北较场老城墙把梅花/别在自行车铃铛上/宽窄巷的石板，轻轻咬住/三色董的尾音/文殊院的黄昏里/玉兰的香气在火锅中发芽”，诗人用拟人手法让成都的城墙、巷陌、花木都活了起来。梅花别上单车，石板咬住花香，玉兰在火锅里发芽，整座城市在花开花落间完成了一场诗意的呼吸。

视角运用上呈现灵活转换的特质，如《三星堆遗址》从“面具在泥土中呼吸”的物体内部视角，切换到“我站在遗址门前”的观察者视角，形成多维感知。戏剧性独白与空间留白亦得到巧妙运用，《周公河的鱼》通篇以“把剑隐忍于头颅”的独白构建戏剧张力，《青堤老街》则以“若你经过青堤/请放轻脚步”的未竟之语营造诗意空间。此外还有跨文体的大胆尝试，《奔腾的大渡河》采用分章节的散文诗形式，融合叙事、抒情与议论，拓展了诗歌的文体边界。

总体而言，这部诗集在主题深度上实现了从地域性到普遍性的超越；在结构艺术上构建了空间与时间的双重秩序；在语言创造上完成了古典诗学与现代意识的有机融合；在意象营造上建立了感知层次丰富的符号系统；在修辞运用上形成了转喻与隐喻的交互网络；在诗歌技术上展现了现代诗学艺术的多元可能。

《蜀葵》以其深植的在地经验与开阔的诗学视野，完成了一次对地域书写的现代性重构。诗人既沉潜于蜀地的山川肌理，又在哲学层面叩问存在的本质；既传承古典诗学的意境韵味，又娴熟运用现代诗歌的表现手法。通过根脉与当代性、物象与精神、个体与历史的多元对话，构建了一个意蕴丰饶的诗歌世界，为当代诗歌的在地书写提供了富有启示性的范式。